

■ 学人素描

# 林毅夫：一位传奇学者的庙堂之路



◎ 邓聿文

林毅夫是从研究我国农业问题入手，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的。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林毅夫原名林正义，出生在我国台湾宜兰。1979年5月16日，林毅夫因水横渡来到大陆，彻底改变了他人的人生。后来，林毅夫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农业经济学，成为1979年诺奖得主舒尔茨的关门弟子。1987年，林毅夫辞去耶鲁大学的工作，回到大陆，成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海归经济学博士。回国后，林毅夫先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所属机构从事研究。1994年，林毅夫进入北京大学，创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任中心主任。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粮食问题、电信改革、银行改革、WTO、通货紧缩、宏观调控、土地问题、农民工问题、住房问题等几乎所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中，都有北大经研中心发出的声音，逐渐受到高层领导的瞩目，成为国家决策的高级“智库”之一。作为中心的主持者，林毅夫积极为中央很多重大决策的制定出谋划策，参与了国家“九五”和“十五”规划的制定，林毅夫本人也被舆论视为官方的重要智囊之一。

如今，林毅夫的头衔很多。除了北大经研中心主任外，他还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等。

## 专注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经济学家

作为经济学家的林毅夫走进社会大众的视野之中，这与他在关于“三农问题”上的一系列建言是分不开的。

1999年，针对当时的通货紧缩形势，林毅夫第一次提出了“新农村运动”的概念。1998年后，中国出现了严

重的通货紧缩、生产能力过剩、新增投资比较小和新增就业机会少等问题。并且，这又造成本该流动的农民流动不出来，已经流动出来的农民又返回乡村。另外，众多乡镇企业在竞争中纷纷倒闭。一方面，这致使农村集体经济负债累累；另一方面，又迫使早先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又回流到农业中。在这种背景之下，农民收入增长特别慢，“三农问题”也更为突出。

据称，林毅夫提出，我国从1979年开始的改革以农村为突破口；20年后的今天，走出当前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内需不足、市场疲软、通货紧缩困境的突破口，仍然在广大的农村。”只有打通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的渠道，消化掉城市中过剩的生产能力，才有可能解决三农问题。

为此，他建议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化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地区和生活消费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启动广大的农村市场。同时，政府要以财政政策的资金积极建设农村基础设施，这对启动中国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因为，这一政策既可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我国早日摆脱通货紧缩，又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和改变农民观念等。

后来，随着“三农问题”变得日益突出，林毅夫提出的“新农村运动”建议及具体内涵逐渐被国内学界及政府部门所认同，这为今后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学术支持。

在林毅夫的心里，他一直未曾忘怀中国的农民。他曾说，如果了解中国的现代史，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就会发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穷人绝大部分在农村，解决了农村的问题，就不解决了中国的贫困？解决了中国的贫困问题，也就解决了世界贫困的一大半。”

对中国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集中体现了林毅夫在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领域的突出贡献。

## 制度经济学研究享誉国际学界

其实，制度经济学也是林毅夫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但他更强调制度的内生性。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就认为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经

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前提是放弃推行带有赶超色彩的发展战略。

他一直主张市场取向的改革，认为只有实行市场经济，理顺市场价格体系，形成比较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信息指标体系，才能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卸除国有企业背负的政策负担（包括社会保障负担和执行赶超战略的负担），培育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是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

针对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问题，林毅夫指出，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在于动员资金和配置资金，资金动员的能力其实决定于配置的效率。在深入研究中国和东亚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基础上，林毅夫总结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假说。他的理论建立在要素禀赋、政府的发展战略及其内生形成的政策制度基础之上，并以企业的自生能力为微观基础。

林毅夫的制度经济学在国际经济学界也享有盛誉。他最早提出并阐述了被国内学界经常引用的制度经济学的两个基本概念——诱发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林毅夫认为，由市场自发诱致制度变迁的这种情况很难出现，因为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必然存在着“搭便车”问题。因此，仅仅依靠诱发性过程所提供的新的制度安排将少于最佳的制度供给，需要政府采取强制性的行动来完成制度变迁。

林毅夫以其对经济学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现实的敏锐观察与把握，成为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在国际最权威的经济学学术杂志——《美国经济评论》和《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的国内经济学家，他也是第一位运用规范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国内学者。但是，这位学者也发出了经济研究要实现本土化的呼吁，除了要学习西方的分析方法、掌握数学工具和培养经济学直觉以外，最根本的是要“有文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要有深刻的了解。

林毅夫的学术研究之路昭示，他对中国经济改革和中国农村问题等都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与认识，这也使他成为目前国内最受关注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 后发优势理论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成果

提起林毅夫，当然也不得不重提

他在2002年时与杨小凯之间围绕着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问题曾展开过一场影响深远的争论。

杨小凯是澳大利亚莫纳斯大学的教授，被誉为华人世界最杰出的经济学家。2002年，杨小凯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后发劣势”问题。杨小凯的“后发劣势”理论在国内外学界引起了一定反响。

林毅夫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并撰文进行了全面反驳。他指出，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就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会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还将必然伴随各种制度扭曲即所谓后发劣势。

林毅夫的“后发优势”理论主要来源于他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说。他用这一学说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做出了严谨的经济学模型。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奇迹，就是成功地利用了“中国劳动力相对价格较低”的比较优势，逐步占领了纺织服装、轻工产品、家用电器等国际市场，快速积累资金，逐步实现产业升级。按照这个学说，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后发优势”：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用较低的成本引进先进技术，加快技术变迁，加速资本积累，提高人均拥有资本，从而提升中国的资源禀赋，实现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的升级。

在争论中，林毅夫进一步指出，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以自由民主为本质的宪政民主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这也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国情。他认为，尽管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宪政体制改革，但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却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这本身就说明技术模仿就能使经济走得很快。当然，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 本期人物话语



## 小额贷款公司注资渠道年内将打通

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10月26日在北京表示，年内有望打通商业银行向小额贷款公司的注资渠道，银监会和人民银行正在就这个文件进行磋商，估计这个文件不会在很长的时间内就会出台。

## 多声道

## 跨地区投资性购房可能征房产税

沈建忠（建设部房地产业司司长）近日在深圳召开的全国城市房地产发展交流协会暨“19+10”个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改革协会第十八届年会上表示，要进一步发挥税收、信贷政策的调节作用，抑制不合理的住房需求。包括：对于购买第二套以上（含）住房以及跨地区购买住房的，不得享受减征契税等有关税收优惠政策；适时开征物业税，抑制大户型住房和投资性购房需求，在非物业税试点地区，对第二套住房以及跨地区投资性购房可恢复征收房产税；降低住房租赁税负负担，引导居民通过租赁等多种方式解决住房问题。

## 我国农村人口为7.37亿人

谢伏瞻（国家统计局局长）10月22日在第四届国际农业统计大会上说，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6%，也就是7.37亿人。为了科学、真实地反映我国现阶段城乡人口、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情况，准确评价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国家统计局去年10月颁布了《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作为统计上划分城乡的依据。与户籍管理部门将人口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不同，统计上的划分标准主要根据居住地，统计的是居住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住在城镇的是城镇人口，住在乡村的就是农村人口。按照上述标准，国家统计局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06年底我国大陆城镇人口为5.77亿，农村人口为7.37亿。

## 全国污染源普查是重大的国情调查

周生贤（国家环保总局局长）10月26日在全国污染源普查协调小组第二次会议中指出，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将于明年年初正式启动。做好污染源普查，是全面掌握我国环境状况的重要手段，是环保领域一项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工作，关系到环保事业的长远发展。当前环保系统要着重做好以下工作：一要结合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进一步提高对开展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二要举全局之力，加强协作，确保普查工作顺利实施；三要扎实做好目前各项准备工作。

## 次贷危机无碍全球经济未来增长

西米恩·詹科夫（世行经济学家）10月25日在一个对冲基金会议上说，与以往由美国、日本和西欧驱动的经济增长不同，在经历了过去7年经济最快增长期之后，随着亚洲、拉美、中东以及非洲的贡献不断增加，目前全球经济增长更平衡。我们正处于一个史无前例的经济发展时期，这个增长全球共享。美国的次贷危机并不会阻碍全球经济增长脚步。至于未来五年的投资走向，资金充裕的发展中国家将把近几年在商品出口繁荣中的获益投向海外；由于局势不稳定，中东地区将把资金投于西欧的房地产和基建等保守领域；俄罗斯的投资将聚焦在原苏联以及东欧国家；而印度将加大在中、东欧以及非洲的非初级产品领域的投资。

■ 经济学家学问故事

## 匹兹堡大学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由来已久

◎ 梁捷

在美国，最顶级的那些经济学家一般只研究美国经济或抽象理论，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并不多。不过，在匹兹堡大学，却一直有学者关注和思考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几十年来也形成了一种传统。前些年，匹兹堡大学经济系的罗斯基教授对中国经济增长表现提出了不同看法，曾引起过广泛争论，足见匹大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背后是长期的积累，是几代学人跨学科研究的共同努力结果。翻阅《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可见，在1959年9月，哈佛著名经济史家、陈寅恪的高足杨联升给胡适去了一封信，讨论在匹兹堡大学设立讲座事宜，并邀请胡适作为讲座开讲人。杨联升还顺便提到并大加称赞匹大的汉学氛围。那时的匹大，竟已隐隐有除哈佛、芝加哥和普林斯顿等名校以外另一个中国研究中心的气象了。

杨联升承认，筹划讲座的主谋是刘子健教授。刘子健在上海长大，抗战前后分别就读于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钻研法律。在抗战结束后，刘子健曾作为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中方法律代表团成员前往日本。不过，他还是在导师洪业的影响下赴美读书，入匹大获政治学学位。此后，刘子健的兴趣逐渐转向历史文化，尤嗜宋史。经过十年积累，刘子健写出了《宋代中国的变法》，并一跃成为国际公认的宋史权威之一。

与此同时，刘子健四处寻找并帮助有才华的中国年轻学者到匹大任教，一同来推进中国问题研究。杨庆堃和周舜莘先后来到了匹大。杨庆堃是燕京大学毕业生，早在1939年就获得了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博士，随后回国进行社会学教学和实地调查研究。上世纪50年代初，杨庆堃再度赴美，在匹大正式执教。

杨庆堃在燕京读书时就已写出《邹平市集研究》，这是国内最早关于农村市集的研究。他运用区位学理论和功能派观点，考察了邹平市集的结构及各种活动，总结出中国农村市集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日后区位地理研究的前驱。后来，他的兴趣逐渐转向宗教社会学。1967年，他在匹兹堡完成了《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这一巨著，被西方学者誉为整体研究中国宗教的一部圣经，至今仍是该方向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

刘子健又找来一位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名叫周舜莘。周舜莘也在上海长大，与刘子健和杨庆堃一样毕业于燕京大学。周舜莘毕业后留校任教，颇得众多教师赏识。抗战爆发之前，周舜莘取得了留学美国机会，于是负笈来美，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取得硕士学位，接着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周舜莘亦非书斋里的学者，他在取得学位后曾在上海的中国中央银行工作。所有那一位经济学家都对当时中国的金融和货币问题有极大兴趣，刘大中、蒋硕杰是如此，周舜莘也不例外。中国在上世纪30年代刚刚改革而值，却不料抗战爆发，金融系统几乎濒于崩溃，通货膨胀威胁在抗战时期已慢慢积累。抗战结束后，处于恢复之中的中国，根本就没有人有精力或有能力全面协调处理当时的中国金融问题。通货膨胀在这时候爆发出来，且出于惯性而一发不可收拾。这是中国金融史上最著名、最黑暗的40年代恶性通货膨胀。

尽管周舜莘自知无力改变什么，在回到美国拿到匹大教职后，他不问政治，一心投入学术研究中，但这段历史却无法在他心中轻易磨灭。所以，周舜莘默默收集资料，要为这段历史做一个见证。

后人对这段恶性通货膨胀历史的研究并不充分。1957年，曾任中国银行总裁的张嘉璈老先生写出《恶性通货膨胀：1939-1950》，以周内身份描述了当时货币政策和通胀情况。周舜莘于1963年正式出版了自己的研究专著，题为《中国通货膨胀：1937-1949》。这两本书的题目几乎相同，资料也互补，但写作手法大不相同。张著多用实际情况予以描述，而周著则在理论分析上更胜一筹，更为冷静和清晰。后来的学者渐渐地对这段恶性通货膨胀历史失去了兴趣，于是张著和周著就成为研究这段经济史的两个里程碑。弗里德曼写作《货币的祸害》和费正清等主持《剑桥中国史》时，凡涉及这段历史就主要参考这两本书。

后来，刘子健离开了匹兹堡，到普林斯顿大学寻求发展。在普林斯顿，刘子健又与牟复礼和余英时等一起，把那里的东亚系建设得举世闻名。杨庆堃留在了匹大，但仍不断关注国内的研究情况。1980年，费孝通倡议恢复社会学教学，第一个就想到了远在国外的老同学杨庆堃。费与杨合作，在国内开办了两期社会学暑期讲习班，这成为中国社会学复兴的标志。至于周舜莘，他在匹兹堡扎根以后，就一直致力推动匹大经济系对中国问题研究，并帮助中国内地建立外文图书馆，还利用他是系主任的便利收了不少中国学生。

虽然这几位先生都已经故去，但他们留下的著作仍然辉煌，思想传播和学风熏陶，从来都比生命更长久。

■ 来自日内瓦

## 瑞士健康保险制度值得借鉴

◎ 徐千惠

最近，我同事的父亲因病住院了，据说是需要肾移植，我们抽空去看望了一下老人家。这家医院位于莱蒙湖边，窗外的风景很美丽。像所有的瑞士居民一样，我同事父亲住院的一切费用都是由保险公司承担的。为此，笔者不禁想到中国的老人和病人了。

在中国，如果生同样病的住院病人，此刻可能不仅要面对病魔的挑战，还要为一大笔的医药费而头痛了。但是，在瑞士的医疗保险制度下，每个病人所需支付的医药费用要比中国的病人至少要少一半，甚至少三分之一。

这里，我们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瑞士的医疗保险制度。根据法律规定，在瑞士居住的每个人（无论外国人还是瑞士人）都需要购买医疗保险。但是，每个人购买怎样的保险单形式一般是由个人决定的，工作单位或政府不得对此进行干涉。

所谓不同的保险单形式，是指每个人选择的年保费最高额度是不同的。例如，如果保险定在2000瑞士法郎，在未达2000瑞士法郎之前的医疗费用需要自付，达到这一保额

后的医疗费用则由保险公司来支付。在瑞士，工作单位一般也会替雇员每月贴补一部分保险费。

当然，保险单形式不同，其价格也是不同的。一般而言，一个四口之家的瑞士家庭每年需支付的保费大约为1000法郎。如果是低收入家庭，政府会给予一定的援助。同时，保险费每年也会有所变化，各大保险公司与医药公司之间每年会互相协商，商定下一年度的医疗保险费用。

谈到医疗保险，自然就要提一下药费问题。在瑞士，药价一般都由政府严格控制的。但是，瑞士的药价其实还是挺贵的。在欧洲各国中，瑞士可谓是唯一一个在制药的研发和生产方面具有领先优势的国家。对此，瑞士人也非常重视这一全球性的竞争优势，他们常常会将注意力集中在瑞士药厂开发的新药产品及其功效。在药品价格定价方面，自然也会涉及到新药研发费用等问题，但除了几大药厂参与药品定价外，政府相对严格控制药品定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在瑞士的医疗保险制度中，最显著的特点是政府希望能让每个人都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险。其中，首先是让每个人有自己选择什么样保

形式的决定权，工作单位或政府不得从中干预；其次是如果个人确实有困难（如低收入家庭），政府会给予一定的帮助。或者是政府每个月给予一定的金钱补助，或者是直接由政府与保险公司进行交涉。同时，政府也尽可能地控制药价。

对此，瑞士人普遍认为，瑞士的医疗质量是相当高的，甚至比欧洲其他国家、美国和加拿大等国都要好。例如，在英国和法国等国，病人只能到指定医院或诊所就医。但是，瑞士人看病就要自由多了。可以在公立医院或私人诊所之间自由选择医生，看病也无需等候太久时间。

目前，瑞士共有87家健康保险公司，每年它们会根据新的统计数据来进行风险评估，并确认下一年度的保险费。

这不禁让笔者联想到目前中国正在展开的医疗体制改革。或许，瑞士在医疗保险制度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正如保险业内的一句话说得很好：没有最好的保险，只有最合适的保险。当然，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也要探索和发现一套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医疗保险制度，以此来造福全体中国人民。